



纵横

诚信为本

常会营

偶得

学会拒绝 守望心田

刘金祥

学人应有怎样的情感世界和表达情感世界的方式方法？这可能是个无需探讨的问题，不管外界如何看待与言说，学人总该与世俗人生保持一些距离，总应秉持一份清高和孤傲，这样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尊严。但客观现实是，学人经常要面对世俗勾引或经济诱惑，而无论是世俗勾引或经济诱惑，都是想把学人拉出象牙之塔，使其步入大众的庸常之中。陷入这种处境中的学人，其情感世界及情感世界的表达方式，也许会变得比较诡异和独特。

近读广东学者兼作家陆健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深刻地感悟到中国学人之不易，充分地认识到学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陈寅恪，一个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敦煌学、考据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大师级学人，他借助写作《论再生缘》的学术方式，通过渴望与人共享快乐的重要形式，敞开自己的情感世界，使人们在尊崇这位学术大师的风骨和人格的同时，体认先生丰富细腻的情感、澄澈敏锐的心境。这种寄情于学术，并且籍借学术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为很多高迈超拔的中国学人所特有。

不过学人们可以承受世俗力量的重负，但在市场经济鼓荡起的物欲诱惑面前，却很难清静下去。事实上，那些向世俗或金钱缴械屈膝的学人，并不能将他们看成真正的学人，只能说他们是穿着学人袍装的功利主义者而已。真正的学人既应当面对世俗昂起自己高贵的头颅，也应当在金钱面前坚守学术良知和道德情操。陈寅恪先生生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时校方只不过提供区区若干斤面粉、一二斤肉、几两油，关键是东西不在多与少，而在于这份特殊关照。陈寅恪却没有因为这些特殊关照而失去自我，后来他甚至婉拒了每日六两肉的照顾，连香港寄来的包裹也原封不动地交给组织，郑重声明不接受来路不明的馈赠。这也许是一种傲岸的文人气度，是学人所应坚守的精神风范，也是被时下人们揶揄嘲弄的清高和作秀。当陈寅恪先生语调和地在校方代表说出无需生活照顾的话语时，显露的是一种不以物喜的平静心态，表征的是一种守护自我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只要有损其人格的任何言行，宁愿不接受施舍式的特殊关照，也要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清洁，这就是传统学人的情感表达方式。

可能不会有人理解陈寅恪的这种行为，但笔者却分明看到了先生所追求的宁静的生活氛围。躁动喧闹是一种常态性的生活方式，但众人们都在享受追逐这种躁动喧闹的时候，真正的学人却获得了宁静。宁静绝非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只有那些理解生活、勤破生命的人，那些精神充实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这种生命的至高境界。对于包括诸多普通学人在内的众人而言，毕竟躁动喧闹的生活是富有实感的，是用金钱和地位、声誉和势力堆积起来的，是能够说得上来的享受，感觉得到的荣华，从人的本性上是无法拒绝和推却的。陈寅恪在人生的旅途中所经历的，已经让他感到足够躁动喧闹的了，外界的干扰侵袭也已经够多了，先生太需要平静、太需要隐身了。他对生命的探寻，对人生的求索，已经为他带来了丰厚的体验，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介书生来说，陈寅恪还能祈求和奢望什么？几两肉、几钱油、几斤米，物质的一切对他都显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只要还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清洁，只要还维护着学人的尊严和人格，一切都是可以拒绝的。学会拒绝，成为传统学人们重要的生存方式。陈寅恪拒绝了，既难能可贵又弥足珍贵，只要你就会之类的隐喻和暗示，在陈先生这里已然不发挥任何功效。作为一面镜子，陈寅恪先生的价值在于，提醒时下学人们应学会向世俗和金钱保持距离，尽可能地保持一份清高和孤傲。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上面集中论述了在去食、去兵与去民信三者之间的取舍问题。孔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首先选择了去兵，因为兵是不祥之器，这在《老子》中也曾提到，《老子》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处，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在这里，孔子与老子的观点是一致的。战争会残害人民，会靡费财物，所以先去除此。这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应该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在去食与去民信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应该选择先去谁？人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人民生死的大事，如果人都饿死了，那么民信似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会流于空虚。从这个角度来说，去食应该放在最后才是，因为民信似乎应该是只有在民生之时才谈得到，如果人民都饿死了，那么还谈什么民信呢？

然而，孔子却并不这样认为，他选择了去食，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去民信。那么，孔子是否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呢？我们看孔子的回答：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之所以选择去食而最终保留民信，是因为他深深知道，民信是比生死本身更为重要的。自古皆有死，从此意义上说，死是古往今来人所不能规避的常事，民信却是一个国家维持其邦国稳固必不可少的要素。宁肯不要粮食了，宁肯人都饿死了，也不能失去民信，这一点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在何种时代环境里，似乎都显得尤为重要。

民信似乎历史上很早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夏桀统治时期，由于奢侈腐化，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即使在此情况下，他还把自己比作太阳，人民都愤恨得不得了，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说，你这个可恶的太阳啊，我愿与你同亡！这里就可以看出民信问题的重要性了，结果在商汤的讨伐下，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夏桀仓皇逃窜，死于南巢。同样，为博褒姒红颜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也落得了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与之相反，商汤与周文王、周武王都是通过和人民之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然后才讨伐桀纣成功的。民信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评价曰：民无食必死，然君子之所必不免。无食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

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

朱熹认为，以人情而言，那么兵食足然后我的威信可以传播于民。而以民德而言，则信本来是人所固有，不是兵食能够得以在先的，所以为政者，应当亲身率民以死守之，不因为形势危急而可以丢弃的。由此，孔子在去食与去民信之间做出的最终抉择，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孔子的这种选择，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吗？诚信诚乃为政治国之本。

此外，孔子还曾夸赞自己的弟子子路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即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因为子路忠信明快，所以话一出口人人都信服他，不用等到他把话说完。人们都夸赞子路说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意思是，人们都说子路没有遗留的承诺。因为他笃于践行所言，根本就不留下什么承诺。《论语集注》尹氏说：当时的千乘之国（大诸侯之国），不相信他们的盟约，却相信子路的一句话，他被人们所信服由此便可以知晓了。一句话就能断案，是因为在他说之前人们都相信他了。不遗留承诺，所以能成全其威信。

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德行。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官到能清

论道

王敬年

我国古代的公正观念

冯兵

公正作为一种伦理意识，至少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较为明确的肯认和表述。如《荀子·正论》中认为，上者为下之仪，下之本，上公正，则下易直矣。只要为政者能够做到公正，则平民百姓自然能够驯服和率直，易于管理。而对于士君子之间的论辩行为，荀子也强调应该守持公正之德，他说：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因此，在古人那里，公正既是为政之政德，也是士君子处理日常生活事务所应具备的私德。

那么，何谓公正？先就公而言，公对应的是一私。《诗经·召南》说：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公指公事、公务，而非私人事务。《礼记·礼运》也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处的公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伦理意蕴，强调的是公心、公义。另如《墨子·尚贤》在提及选贤的标准时说道：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公与私在此便被作为一组相关联的概念予以使用。因此，公的核心意涵就是辟私怨，即无私。而公正也常与无私相关联，如汉代的《白虎通德论》卷一释公这一爵名时道：公者通公正无私之意也。《孔子家语》评价孔子弟子澹台灭明也说：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等等。公的具体行为表现则如东汉荀悦于《申鉴·杂论》所说：不任不爱谓之公，即不纵任私心，不偏爱偏袒。

至于正，《论语·颜渊》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要求君主秉持正义，行为正当，并以此先正己而后正人，天下即可垂拱而治。此处的正在伦理学意义上便是指正义、正当。而正的核心意涵乃为中。《管子·法法》篇就曾阐明了中与正的关系：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又说：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在管子看来，正具有正定万物之命，即使得万物各循其天性顺利

生长繁育的功能，而圣人立中以生正，正源于中。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认为中庸之道乃至上之德，并指出过犹不及皆非中，中显然是指无过也无不及。宋儒朱熹便解释说：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论语集注》）又道：不偏之谓中。（《中庸集注》）可见中所强调的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最高智慧与德性。前述管子认为正的目的就是止过而逮不及，并指出过与不及皆非正，说明正既源于中，也就具备了中的内涵。

正以中为基本意涵，而前述之公即无私，无私的具体表现为不任不爱，无所偏私，亦同样有着中的内在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说，求公正必以中，中是公正之德的内在要求与实践原则。而中的外在表现或标准则是礼。如荀子就说：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中既是礼之核心理，而礼显然就是中的外在化规范与准则。我国传统的礼通常具有哲学与伦理思想（礼义）、风俗习惯（礼俗）、文化仪式（礼仪）、制度规范（礼制）等层面的意涵，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各有侧重，荀子此处所说之礼显然是以外在化的仪式与规范为主。由此可见，对公正的讨论在战国时期就有了突破内在德性而走向外在社会规范的自觉意识的萌芽。

今天有学者指出：传统伦理实质上是一种个体修养伦理或为己之学，这决定了传统伦理不可能对社会公正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公正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在中国，自古论公正者不少，但重在论品德的认识，而且公正问题一直处于非社会意识状态。（任者春：《公正：当代伦理的精神指向》）这种观点在思想界有一定的代表性。总的说来，此言大致不差，传统伦理在观念层面似乎的确存在重视个体修养而轻视制度公正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在华夏文明的早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但考虑到早在战国时期如荀子等思想家对公正与制度性的礼



獬豸：公正的象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

（早期的礼通常包括了法）两者间的联系的论说，以及礼、法随着后来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分离，社会法制的相对逐步健全与规范等社会历史现实，古代的社会主体公正实际上也并非是一直处于非社会意识状态的。譬如，在我国的历史王朝中，大都具有较为完备的谏议、监察等制度。如不杀白衣卿相的宋代，其台谏系统相对更是完备，士大夫的弹劾对君臣都有着较为重要的警诫作用。同时，其监察制度、公用钱券食等管理机制更是对权力运用有着较好的制约。事实上，儒家学者把匡正权力当成是士人的权利和义务，儒家不断尝试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系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发展出一套包括保傅、宰相、封驳、台谏、三司、经筵、制举、轮对、清议等内容的丰富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匡正制度。（彭永捷：《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和方法》）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思想意识层面还是在制度建设与政治实践层面，为了有效地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我国传统社会自先秦以来对公正问题一直都是有着一定程度的社会自觉意识的。然其中的一些观点和举措已不适用于今天，但无论是作为政治伦理规范还是个体私德要求，公正都已成为华夏民族一以贯之的伦理精神与文化基因。而面对今天的各种新问题与无限可能的发展未来，传统的公正观念也仍然具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传统文化与严以修身

石志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强调的德政思想核心要素就在于修身。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修身对于执政者和普通群众的重要性。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对于执政者，要坚持修身为本，在修身为本基础上进行治国理政；对于普通群众，也要坚持修身为本，在修身为本基础上进行为人处世。只有这样，治国理政效果才会好，为人处世效果才会好。

古人通过正心、立德、改过等方式来实现修身之目标。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韩愈的这段话告诫我们首先要纯正自己的思想，也就是先正心，才能够实现修身这个目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思想能够对具体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北齐有个大臣叫王肱，少年时期就读了许多儒家方面的书籍，深知修身的重要性。十三岁时，王肱见到了当时扬州刺史郭元贞，叙说自己常看《孝经》，并到《孝经》中的在上不骄，为下不乱。作为贻言送给郭元贞。王肱之后的从政历程和所作所为也都是按

照儒家思想中正心修身要求去执行，建言皇帝广宽仁之路、鼓之以道德，终成一代名臣。修身不仅要正心，还要立德。古人把树立道德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太上有立德（《左传》），君子怀德（《论语》），君子以成德为行（《周易》），这些宝贵的思想都在强调道德在我们工作、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古人通过道德教化、惩之以不道者来营造敬德、树德、立德的良好氛围。古代有个地方官叫仇览，自身道德修养非常高，还把修养好的道德品质通过教化的方式传导给老百姓，使得老百姓把道德修养内化为心、外化为行，矫正不良的个人习气，规范撕裂的社会秩序，使得当地出现民风淳朴、人心向善、和谐共处的局面。当地有个中年男子由于不孝顺受到其母的控诉，仇览了解整个事情后，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感化了这个中年男子。该中年男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当地百姓编民谣来赞誉仇览道德教化在移风易俗过程中的良好效果：父

母在哪边，就在我家庭院；感化了恶鸟，哺生它的父母。通过道德教化，个体特别是官员如果不接受这种教化，甚至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就要接受相应的惩处。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朝代，从皇帝到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孝，对于那些不孝的官员进行制度约束和相应的惩罚，使大家看到自身由于不孝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汉代有个官员叫薛宣，官给事中，颇受朝廷重视，继母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服丧尽孝，被免职。修身不仅要正心、立德，还要改过。每个人都有先天、后天的缺点，这样、那样的不足，都会在工作中有一些失误、犯一些错误，如何看待这些缺点、不足、失误、错误，就要通过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来改正、纠正、矫正。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过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易论第九》）。